

第二黨的興亡

王覺源

——中國黨派滄桑錄之一

正名反被小名所掩

今日提起「第三黨」，四十歲以下的讀者，或許還很生疏。何以生疏？實由於第三黨並不是正式黨派單位，祇是習慣相沿，對該黨的稱呼。易言之不是其黨的正式名稱，祇算是其黨的小名或渾號。經時既久，正名反爲小名所掩。何以正名不彰，小名反而大行其道？大概也有幾種原因：第一、第三黨原來是有正式名稱的，祇因其態度不够光明，作風不够正派，不被社會人士所尊視。相傳「第三黨」之稱，是始於黨國先進吳稚暉先生一句戲言，大家沿之，黨名雖歷經改換，國人始終以「第三黨」稱之，鮮知其正式黨名。故國人對於「第三黨」之稱，捨其正，取其小，究其意義，頗有譏刺輕鄙的味道。第二、自鄧演達組黨開始，黨名不斷變更。前名不永，後名無壽，由一世以至最後第五世，章伯鈞改爲「中國農工民主黨」，傳統亦以「第三黨」自居自稱；但祇傳於口頭或私人筆墨，而不見於正式的公文書。此或因其黨如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」等之命名，過於冗長，不免囁嚅。刪繁就簡，

棄正取偏。果如此，則又不免自暴自棄，自取其辱。第三、第三黨爲組合「中國民主同盟」三黨三派之一，原是以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」名義入盟的。後來民盟羅隆基與章伯鈞吵架鬥嘴時，羅隆基動輒就說：「你們第三黨如何……如何的」。亦足見其同路人之中，對於第三黨的本名，也有輕視與否定的態度。第四、第三黨數度改名，最後爲「中國農工民主黨」，僅爲一項擬議的名稱，還沒有正式開會成立，便不能據以爲實。舊名放棄了，新名還未成立，無以名之，祇好仍以第三黨名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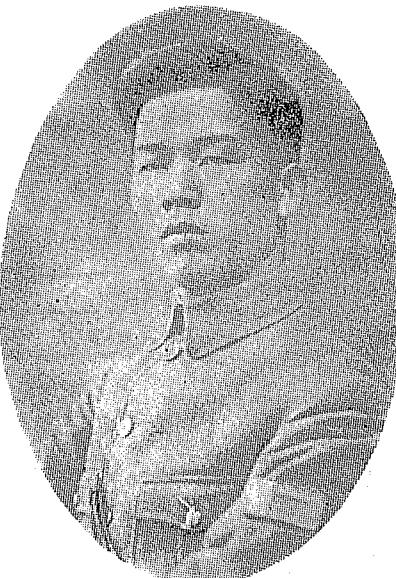
綜此種種原因，第三黨的正名，列於經傳，不爲人注意；小名不見於經傳，反爲人所樂道；即無怪以偏壓正，正名反被小名所掩。第三黨雖是虛有其名，却仍有其實際的一面。這實際面的歷史淵源與其組織內容，也相當的複雜。簡略述之於後。

我在「中國民主同盟內幕」一文中（見「中外雜誌」第一四九期至一五一期），已經討論過

農工民主黨」，傳統亦以「第三黨」自居自稱，

：第三黨爲「民主同盟」三黨三派組合之一。我們認識了民主同盟，想到物以類聚，對於第三黨之性質、內容與其政見主張，就可思過半矣。民主同盟的名稱，經過幾次改頭換面。同樣的，第三黨的廬山面目，也有過五度的變換。對日抗戰時期，所有黨派中，第三黨乃是變換黨名次數最多的，自其開始組黨，至最後更名的一代，前後五世，整整有二十年的歷史。時當民國十六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到了武漢，鄧演達與共產黨勾結，爲與南京中央政府對抗，正式組織了「中華革命黨」。自己標榜介乎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，爲國共兩黨以外之第三個政黨。國人亦習以第三黨稱之。是爲第三黨一世。嗣以其黨名與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民國三年所組織之「中華革命黨」，名稱相同。乃於十九年，藉整理黨務的機會，改稱爲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」，是爲第三黨二世。二十年，鄧演達以危害民國罪處死後，樹倒猢猻散，該黨即分裂爲三：一、黃琪翔（廣東人，十六年代理第二方面軍總指揮）在華南組織「社會民主黨」；二、徐謙（字季龍，安徽人，曾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）在華北組織「農工黨」

小有才未聞君子之道的第三黨發起人鄧演達。



」；雖各仍以第三黨自居，却未拿死屍鄧演達作號召。三、章伯鈞在武漢組織「中華農工黨」，自詡繼承鄧演達的政策，以第三黨正統自居，是爲第三黨三世。二十四年，章伯鈞復將該黨改名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」，是爲第三黨四世。三十六年，再改名爲「中國農工民主黨」，則爲第三黨五世。這就是第三黨，在二十年歷史中，五度變換面目的過程。

中國農工民主黨，在其黨章第三條中，明白規定：「本黨以鄧演達先生政治主張爲基本政治綱領。繼承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（第三黨）之歷史系統」。這在繼承與主張上，固然都很明白。不過「中國農工民主黨」，僅爲三十六年一月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，第四次幹部會議所擬改稱的。但必須經過「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召開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」（亦四次幹部會議決定）的法理手續，方算正式成立。嗣

因政府宣佈民主同盟爲非法團體。該盟於三十六年十一月六日，自動宣佈解散。凡與民盟組合有關的各黨派，亦自動取消或轉入地下，不敢公開活動。故中國農工民主黨，尚未到召集大會正式成立之前，即已胎死腹中了。糊糊塗塗仍以第三黨目之尚可；如謂爲第三黨之「正名」，似又不可。

第三黨初創的過程

國民革命軍北伐。十六年底定長江上下游。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，隨即奠都南京。共產黨把持武漢政府，與南京中央對抗，形成寧、漢分裂對峙的局面。鄧演達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（簡稱總政治部）主任，在武漢政府中，左右逢源，爲紅極一時的人物。以跨黨關係，一方接受共產黨的祕密指示，出作國共的調人；一方利用動盪環境，發展個人的野心。乃向國共兩黨建議：「共產黨立即解散，與第三國際斷絕

關係，國民黨改組，與共產黨合併」。這分明是共產國際與鄧演達的絕大陰謀。國民黨以「聯俄容共政策」吃了大虧的經驗教訓，不但拒絕了此項荒謬建議，且積極進行全國的清黨運動。鄧演達以陰謀未逞，乃憤而退黨，以第三者的姿態，從事組黨活動。適譚平山（中國共產黨發起人之一。十三年，任國民黨農民部部長）因反對共產黨殺人焚燒過火的暴動政策，而被共產黨開除了黨籍。兩人臭味相投，野心一致。乃聯絡早被共產黨開除黨籍之章伯鈞、彭澤民、韓符麟、葉挺等。於民國十六年，在上海祕密成立了「中華革命黨」。由譚平山在國內主持黨務；鄧演達與陳友仁（廣東人，曾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）則在國外支援。該黨成立後，鄧演達則潛赴莫斯科，與第三國際進行祕密勾結。時第三國際以其所領導之「中國革命」失敗，正感束手。即對凡反國民黨的左傾組織，亦無不予以祕密援助。該黨特

有國際靠山，十八年，乃以「中華革命黨中央臨時政治局」名義，發表宣言。主張：「中國革命，需要科學的三民主義，走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，達到社會主義的建設」。即企圖以曲解的三民主義作號召，以迷惑國人視聽。但三民主義就是三民主義，那有「科學的」與「不科學的」分別？國父的見解：社會主義包含在民生主義之中。民生主義，正是走向非資本主義，邁向世界大同的道路。第三黨的主張，實屬無的放矢。理論上的曲解，不能自圓其說，自然也就不能够發生影響效果。

民十九年大肆發展

第三黨的主張，由於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，發生效果。信仰中心，便不可能建立起來。益以行動上的矛盾，疑慮難釋。以致該黨內部，意見紛歧，漸而至於不易調和的地步。鄧演達見形勢嚴重，乃由莫斯科返國，親自主持，重加整頓。十九年九月一日，在上海召開全國幹部會議。通過政治綱領，發表正式組黨宣言。並因其黨名與國父手創的「中華革命黨」之名稱相同，乘機改名爲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」。當奉孫

夫人爲該黨領袖。孫夫人並未實際參加該黨組織。其時正值國家多故之秋。各路奸豪傑，以時勢造英雄，即多躍躍欲試。該黨各方奔走誘騙拉攏的結果，收穫頗不算少。在改組三數月之內，據說已增建了十一個省區及三個市區的組織，黨員已達四千餘人。在武漢勢力最大，曾一度竊奪了國民黨在武漢的黨權。在江西亦有相當基礎。

在上海發行了行動日報、週報、及國際文化、燈塔、思潮等刊物，作其理論宣傳。並打入社會各種組織，滲透滬杭甬鐵路工會、海員工會及各紗廠。在香港策動華南軍隊叛亂。誘惑李濟深協助其組織，並發行行動半月刊。在東北方面，則勾結野心軍閥楊宇霆、郭松齡等，且獲得鉅款資助與其他的支援。並在瀋陽成立一大據點。鄧演達且親赴北平，推進黨務，吸收黨員。在軍事方面，因鄧曾與黃埔軍官學校有關係，在上海成立「革命黃埔同學會」，誘惑失業與意志不堅的黃埔學生，參加其叛亂活動。如北方石友三、劉桂堂等的先後作亂，無一不是該黨煽動的結果。一時氣焰之盛，轟動各方，可說正是該黨的黃金時代。祇是好景不長，如泡影一般，瞬即消逝。不過數月，至二十年八月，鄧演達被捕後，這組織也就瓦解了。

鄧演達其人與其事

第三黨由鄧演達發起，組織、領導，他自是該黨的唯一領袖。他之爲人，在未搞第三黨以前，聽說循規蹈矩，還不很壞。能吃苦耐勞，小有才能，而未聞君子之大道。北伐時，任總政治部

主任、長袖善舞，名動江漢，頗爲左傾青年所仰望。因此，第三黨的下層份子，多係因鄧個人關係而加入者，並非有什麼中心信仰。他一生的發跡，則完全是由於前總統 蔣公的提攜培植。

鄧演達，字擇生，廣東惠陽人。民前十五年生。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學生。民國八年，投入陳炯明部，初任排長。九年，隨陳炯明回廣州，升任憲兵連連長。十年升爲工兵營營長。都是做

的反革命工作。十二年，國父討伐陳炯明。鄧始棄暗投明，起義反陳。因入粵軍（許崇智總司令）任第一師第三團團長。十三年，黃埔軍官學校成立，鄧代表李濟深參加籌備工作，得任軍校教練部副主任。未久，復繼何應欽先生爲軍事總教官。時 蔣公任軍校校長，見鄧演達律己、治軍頗嚴，任事亦頗負責，爲黨選材，即有意予以培育。故鄧入校未久，即奉派赴德國考察軍事教育。翌年返國，繼王柏齡先生爲軍校教育長。再改調潮州分校主任。十五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，鄧被破格擢升，特任總政治部主任。鄧演達由革命叛徒陳炯明部下一個小小排長，官階不過少尉。在七八年之間，步步高陞，即一躍而爲特任總政治部主任（中、上將）。其官運之亨通，當時似無出其右者。

北伐軍事進展神速，總司令 蔣公，以前方

軍事倥偬，乃將後方責任，委給總政治部。鄧演達有權在握，竟恃寵而驕，逗留武漢，倒行逆施。一方與共產黨暗中勾結，實則全被共產控制；一方祕密組織自己的私黨——第三黨，展開蓄謀已久的活動。僭竊總司令的職權，發號施令，陰

謀奪取武漢政權作佈署。其事皆爲總司令 蔣公所悉；但 蔣公初爲顧全大局，愛人以德，極力

容忍未發。而鄧則得意忘形，更爲放恣。十六年三月，擅派何遂爲軍長，擅在上海、南京設立總政治部辦事處，以共產份子林祖涵、郭沫若分任主任，即等於共黨駐滬之機關，遙與武漢呼應。

鄧公爲杜塞亂源，一方封閉其辦事處；一方升任憲兵連連長。十年升爲工兵營營長。都是做

的反革命工作。十二年，國父討伐陳炯明。鄧始棄暗投明，起義反陳。因入粵軍（許崇智總司令）任第一師第三團團長。十三年，黃埔軍官學

校成立，鄧代表李濟深參加籌備工作，得任軍校教練部副主任。未久，復繼何應欽先生爲軍事

總教官。時 蔣公任軍校校長，見鄧演達律己、

治軍頗嚴，任事亦頗負責，爲黨選材，即有意予

以培育。故鄧入校未久，即奉派赴德國考察軍事

教育。翌年返國，繼王柏齡先生爲軍校教育長。

再改調潮州分校主任。十五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

，鄧被破格擢升，特任總政治部主任。鄧演達由

革命叛徒陳炯明部下一個小小排長，官階不過少

尉。在七八年之間，步步高陞，即一躍而爲特任

總政治部主任（中、上將）。其官運之亨通，當

謂爲有始有終。

參加閩變利用抗戰

民國二十年，鄧演達以危害民國罪被捕處死後。第三黨以個人爲中心的組織，遂趨分裂。黃琪翔等組織「民主社會黨」，活動於華南；徐謙等組織「農工黨」，又名「中華農民勞動黨」，活動於華北；章伯鈞則組織「中華農工黨」於武漢；仍各以第三黨爲號召。其他大部附從份子，

三第興亡

深恐沾染政治麻煩，則全作鳥獸散。極少數份子，原與汪精衛有淵源者，則加入了國民黨的改組派。至二十二年，黃琪翔宣佈解散第三黨，一致參加人民革命。與陳銘樞等合組「生產黨」。發動十九路軍在閩叛變，組織所謂「人民政府」，圖與盤踞江西的共產黨，互相呼應，顛覆中央政府。不過臺花一現，未久即告弭平。徐謙與譚平

山，雖也以第三黨號召一時，但於閩變解決後，亦皆宣佈脫黨。至章伯鈞所率三五殘餘份子組織之「中華農工黨」，則完全是買空賣空。至此，所謂第三黨者，則已瀕臨名實俱亡的邊緣了。

第三黨由日趨沒落，到了名實俱亡的地步。而鄧演達的陰魂不散，其黨的殘餘份子，仍不甘於寂寞，因有章伯鈞、彭澤民等的「復黨」運動發生。其時所謂「人民陣線」運動，正在法國、西班牙等國，鬧得轟動一時。二十四年，我國上海也有不少自命爲前進份子與左傾文人，在共產黨煽動指使之下



北伐初期的鄧演達（中）和郭沫若（右）

，發動了這一運動，與中共所謂「抗日聯合戰線」、「民族統一戰線」等口號相呼應。章伯鈞以爲機會到了，與彭澤民等聚集於香港，共商復黨工作。是年十一月一日，在香港召開所謂第二次

參加民盟鼓動波瀾

對日抗戰，我軍轉進到了武漢。政府爲國人之意志集中、力量集中。二十七年，遴選各黨各派人士與社會賢達，在武漢成立國民參政會。而各黨派的人士，因之亦獲得互相聯繫，交換意見的機會。章伯鈞與彭澤民等，原是毫無名望之輩，酬酢於各黨派之間，展開政治掮客的活動，亦開始被人所注目！進而與沈鈞儒、羅隆基等，藉口貫澈實行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「抗戰建國綱領」，發動組織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，從事在野黨派的團結合作活動。準備以集體力量，作爲與政府交涉的後援。武漢棄守後，中國共產黨亦積極進行其陰謀活動。因而與國民黨的磨擦

臨全大會。到會者僅十九人，均自選爲中央委員。並決定將黨名「中華農工黨」改稱爲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」，仍稱第三黨。照例發表「行動綱領」及「對時局宣言」。其實仍屬買空賣空的作法，並不爲國人所重視。二十六年，中日問題，日益嚴重。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集談話會時，章伯鈞與彭澤民兩人，曾上書委座，提出八項主張。二十七年七月，政府爲團結抗戰國力，遴選各黨各派人士及社會賢達，在武漢成立國民參政會。該黨章伯鈞，得被遴選爲第一屆參政員。章伯鈞初步目的實現，以青雲有路，即於是年，在武漢召開該黨第三次臨全大會。通過所謂抗戰時期政治主張。並選舉章伯鈞、彭澤民等五人，爲中央委員。從此積極展開活動，漸爲時人所注意。該黨也因之得到起死回生的機會。

，亦由陰暗而日益明朗。章伯鈞等，有了新的題材，乃以「統一建國」爲藉口。企圖以和事佬的姿態，折衝於國共兩黨之間。因而改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，爲「統一建國同志會」。藉口國共兩黨之「統一」要求政府「實行憲政，結束黨治」。這與原來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的本質，顯然不同了。由對政府「似乎友善」的態度，開始對政府與國民黨有了不利的批評和苛刻的責難了。這一強烈的轉變，章伯鈞是比較最賣力的人。

第二屆國民參政會，章伯鈞的代表資格，竟然落選了。章伯鈞老羞成怒，不去自我檢討，反對政府與國民黨的攻擊，變本加厲。章伯鈞與中國共產黨，原有歷史上的勾搭關係。不過因鄧演達之死，而中斷了一時。至此即欲挾寇自重，重依中共；中共亦欲利用章「狗急跳牆」的心理，施以控制。會其時（三十年春），新四軍叛變事件發生，政府對該軍加以制裁。中共亦欲利用各黨派爲之撐腰，聲援叛逆。乃唆使章伯鈞串通沈鈞儒，聯合其他黨派，組織「民主政團同盟」。

使各黨各派，名與中共平等合作，實則依附中共，作爲中共的藩籬。三十年十二月，太平洋戰事發生。「民主政團同盟」因國際局勢的變化，亦不幸走上窮途末路，瓦解於香港。旋中共以其尚有剩餘價值可供利用，復策動章伯鈞等，作復活該盟的活動。將該盟改爲「中國民主同盟」，予以精神和物質的援助。中國民主同盟於三十三年九月成立。論功行賞，第三黨章伯鈞以貢獻最多，乃得任民盟中央常委兼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。該黨擔任該盟中委者，尚有張雲川等多人。後來民盟與中共作更進一步的勾結，簽訂長期合作；獲得經費保障；使民盟基礎漸趨鞏固者，亦以章伯鈞出力最多。第三黨在民盟之中，此時不僅已在本部佔有相當地位。民盟南方總支部及港澳黨務，旣均掌握在該黨李章達等的手中；而北方總支部，亦爲該黨張雲川等所包辦。第三黨在民盟之中，旣佔有如此優勢，固使該黨得以逐漸騰達，亦屬內不斷鬥爭的重要原因。此外，章伯鈞之所以始終支持民盟者，尚有三種重要原因：一、民盟係中共所支持，且係章伯鈞牽線所組成。他爲追隨中共，不能不支持民盟。二、第三黨下層份子甚少，本身力量極弱，非憑藉民盟不能生存。三、章伯鈞素有政治掮客之稱，他爲抬高身價，必須藉民盟的集體力量以自重。故章伯鈞能始終立於民盟而不墜者，因爲託庇於中共的支持，亦上述三種因素，有以成全之。

托庇中共終成尾巴

第三黨利用民盟作護符，始得由沉寐而復活而騰達起來！這並不是章伯鈞有其他雄厚的資本。實由於他又作了中共的工具，受了中共的長期的豢養與庇護。章伯鈞最初與各黨派結合，組織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時，對政府的態度，尙謙恭。建國同志會之後，小人得志，便忘其形。對政府極力予以攻擊；對各黨派則妄自尊大。政府對此破壞抗戰團結之徒，從此便不予以重視，各黨派對此目空一切的伙伴，亦覺無結納之必要。因之，章伯鈞即被摒於第二（三十年三月）第三（三十一年十月）兩屆國民參政會大門之外。直至第四屆參政會時（三十四年七月），章伯鈞爲民盟的組織，出力居多，復佔有盟中的重要地位。托庇於中共的協助，始得再度選任參政員。

投之以桃，報之以李。從此章伯鈞即主張「民盟與中共合作到底」。抗戰勝利後，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。章伯鈞復得以民盟代表之資格參加，自仍爲中共所安排。因爲民盟，這時已全被中共所控制。政治協商會議舉行時及會後，各種協議，第三黨與民盟，無不與中共取一致的態度。章伯鈞且通令其所屬十二省區的常委會，爲其和平建國綱領，努力奮鬥，並要求政府承認「東北民主聯軍」，成立東北地方的「民主聯合政府」！反對「五五憲草」；反對「舊國大代表」。凡中共所提出之主張，不論黑白是非，該黨無不追隨附和。復與中共在香港合作宣傳，組織「黑白叢書出版社」、「海滙通訊社」。在廣東東江合辦「東江縱隊幹部學校」，培植下級幹部。並由季方出任中共偽蘇皖邊區政府副主席。出版「中華論壇」與「青年學習」週刊，作爲宣傳機關。中共組織「華南民主聯軍」，陰謀發動叛亂。章伯鈞則指派第三黨之李章達、彭澤民等，積極參加協助。中共轉入地下工作，第三黨則極力爲其工作同志作掩護，並佈置交通路線。凡此種種，均足證明，第三黨與中共之狼狽爲奸，一切服從中共而莫敢違。左舜生先生喻之爲「中共的尾巴」，實屬不寃。